

美國杜魯斯家庭暴力

社區介入模式的介紹

張錦麗

王珮玲

柯麗評

前言

家暴法的目的在於防止家庭暴力的發生，並且促使家暴被害人得到相關的保護及服務，加害人則經由司法系統的介入，能夠對其暴力行為負起責任，且經由適當的處遇計畫，能夠改變其暴力行為。然而臺灣在實施家暴法三年之後，我們不禁要深切自問，「臺灣的家庭暴力問題」真的得到改善了嗎？至今為止，雖無確切的統計數字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經由媒體慌目驚心的報導，我們發現幾乎每天至少就有一位民眾是因為家庭暴力而死亡，而且死者大部分是婦女。

為什麼在家暴法實施之後，家庭暴力仍無所不在，甚至奪人性命呢？家暴法的實施，似乎啟動了社會大眾對於家暴議題的關心，但是就家庭暴力防治工作而言，仍有「徒法不足以自行」之嘆，如今可由「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實施經驗，再度得到證明。

法律或許可約束人的行為，然而對改變人們的思想與觀念，似乎顯得力有未逮，目前整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挑戰的不純然是我們對於家庭暴力的觀念與迷思，更直接將臺灣長久以來各個系統各行其是、故步自封、相互輕蔑的態度暴露無遺。有鑑於此，在有幸一窺美國最早以防治網路連結方式所整合的社區模式——杜魯斯家庭暴力社區介入方案（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簡稱DAIP）後，特於此撰文與關心臺灣家庭暴力的每一個朋友分享，希望透過本文對於此方案的介紹，讓我們重新思考整個防治系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如何合作以讓大家的工作推動得更順利，使家暴防治工作的夢想「斷絕或減少家暴的再發生，讓家真正成為有愛無傷害的避風港」可以早日實現。

一、發展緣起

儘管美國各州在一九一一年，就已通過了禁止虐妻的法律，但遲至一九七〇年代後，因受暴婦女運動的崛起，才開始真正逐漸落實。一九八〇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杜魯斯家庭暴力社區介入方案的開展，也是此趨勢下的產物之一，該地區的倡導者發現受虐婦女並未受到應有的保護，其原因並非只是個人的因素，而是意識型態與影響所及的相關系統、制度、流程、措施等均不利於受暴婦女，因此如何以一種新的模式，改變相關的理念與程序，就成為杜魯斯模式努力的目標。

一一、理念與貢獻

杜魯斯家庭暴力社區介入模式，係美國最早的家庭暴力防治跨單位整合方案，倍受北美及歐洲地區的推崇，目前在世界各地，超過五百個家庭暴力防治方案，是依循其模式的發展。

其最重要的理念與目標有三，一為保護受害者安全，二為要加害者為其行為負責，三為要改善對家庭暴力的社區縱容文化與情境。

三二、方案運作

杜魯斯家庭暴力社區介入模式，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方案，其主要功能為協調社區中負責家庭暴力案件的執法者（含檢察官、警察、緩刑監督官（probation officer）、法官與行政人員）、心理衛生人員、被害人倡導團體等，具有保護受害者安全的共識後，並進一步透過政策發展、流程訂定、相關表格製作、資訊整合、評

估作業啟動、監督機制設置、問題解決等相關的操作，以落實保護被害者的安全（Shepard and Pence, 1999）。

政策發展

政策指的是一種行動的路線，或者稱為企圖的陳述（詹火生，二〇〇〇），換句話說，它是一種有目標的行動方針，主要功能為在錯綜複雜的情境中，尋求較有效能的行動方向。

在杜魯斯運作的模式中，其政策的發展清楚可見，且透過不斷的溝通，成為各單位的共識，並指引各單位實務的發展，以下是其政策的軸心：

以社區與司法為主的整合，是較能確保被害人安全。

整合的過程中，團隊的合作是其核心，而團隊的成員必須更具包容而非排他性、願意接受別人的檢驗與建議，而心無抗拒。

改革的重心應放在社區的機構而非個人。

建立每日操作化的標準流程與相關表單，以確保工作者的品質。

質。

了解政策下的規範性效果，並同時注意規範對特殊族群與案主的負面影響。

了解家暴個案的不同類型，並採取不同的處理策略。

建立資訊分享的機制，確認哪些資訊可向網絡的成員公開，哪些資訊並不適宜。

建立評估的工具、流程、表格。

建立以個案為中心的追蹤機制，並時常發現問題。

建立解決問題的機制（如問題單與建立各級對口的聯絡人），

並將具體的協議，以書面的方式存證。

將上述的成果，化為不斷訓練的教育內涵。

由於杜魯斯家庭暴力社區介入模式非常重視司法的改革，因此也有針對司法介入方面的重要政策，其具體方向不外三大內容，一為保護受虐婦女，二為幫助法庭褫奪施虐者的公權，三為改變責備受害者的常規。具體說明如下：

受害者必須被安排到緊急安全的庇護地點。

要告知受害者資訊和法院所提供的必要服務，受害者不必因為擔心警政單位或法院保護所需要的費用，因付不起而拒絕被保護。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精神是為了保護受害者以及公共安全的利益，而使用法律系統介入，因此不得因為拘禁攻擊者而讓受害者置身於更大的危險中。故介入的首要程序，應該要執行保護受害者免於進一步被傷害的政策與協定。

介入的程度應該依據使受虐者免於進一步被傷害，以及嚇阻施暴者為重要目標。在其他安全措施無效的時候，應考慮使用入獄或服刑。但更多的刑期並不表示對受害婦女有更多的正義。

司法刑事系統所執行的政策和程序，應該透過在外的受虐者倡導方案與婦女保護組織的持續引導與監督。

介入的首要重點應該是放在阻止施虐者使用暴力，而不是改善或終止關係。

政策和程序的制定應以嚇阻社區暴力為行動方針。

一般而言，在判決訴訟時，法院不可對受害人指定其作為，例如，當受害人不願作證時，不得以坐牢做威脅，迫使受害人作證；

也不能命令沒有施暴的受害者接受治療。

法院和執法單位應該要和被害者保護組織合作，提供保護／庇護課程，和盡可能提供司法上足夠的資訊。

在適當的時間，法院應該為施虐者指定教育課程，如果有持續的騷擾和暴力行為時，則應加重刑罰。

所有的政策和程序指導方針應經由非主流文化的社區成員審閱，這些成員包括有色人種、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低收入者。他們應該仔細審查在執行政策時不得有種族、階級和生活方式的偏見。所有的執行和政策應該要持續接受評估和討論，以確認它們保護所有受害者的成效，並為各單位提供持續的訓練。

所有的介入措施都要考量施虐者和被害者之間不平衡的關係。

實務的操作

可分為團隊合作、以個案為中心的監督機制、處理原則與流程、發展評估的策略與方法、解決問題的機制與策略以及持續與強化案例研討的訓練等六大內容，茲分述如下：

團隊合作：由於杜魯斯模式是以社區與司法系統的連結，為核心的整合性方案，因此跨單位與領域的合作，常成為推動成功與否的關鍵，而究竟何種知能是整合型團隊合作的基礎，以下是較重要的概念知識與技術：

溝通與協調：又可分 態度：平等、尊重、真誠、對事不對人。 對口：各單位與層級應有負責溝通與協商的人。 方法：情通則理通、找到共同的利益、願景為先細節在後、避免陷入情緒化的泥淖。 形式：正式與非正式溝通並用，一般而言，非正式在前，

正式在後；非正式溝通重執行，正式溝通重決策。結果：要以書面的方式，確認各單位的職責（簽下約定）。

激勵：找到合作的利基、對方的優點與執行的成效，不斷化為語言、文字與符號，大肆宣傳與鼓勵。

擴大視野：不能只從自己的專業看問題，必須學習從別人的專業、被服務者或是多元的角度看問題。這也意味著個人必須開放過去的經驗，重新再學習，其中包含價值與專業的反省、批判與重塑。

權力的公平運作：不論是工作者與機構間，或是工作者與使用者間的權力關係，甚至是所有參與者間的，都必須朝向反壓迫的、公平的對話模式進行。因此在一個合作的模式中，不僅要賦權與所有參與的同僚以及使用者，也要增權權力較弱的部門與參與者，其中最難的部分不是只有權力的分享，還包含自願的權力割捨。

了解差異：差異表現在二個不同的層次：一為個人的層次，諸如不同的個性與專業、二為組織的層次，此涉及組織的職責、權限與利益，了解後才會避免誤會、產生諒解，進而尋求解決之道。

建構一個開放的環境：為追求共同的目標，必須認知與討論相關執行中的困境、緊張、壓力，因此建構一個鼓勵討論、分析、反映的安全環境則為必要。

建立夥伴關係：去除專業與心態上的傲慢，諸如倡導者認為只有她們才最關切受暴婦女的利益，而司法人員也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公平客觀，其實真正的事實，是需要這兩者（各單位）虛心的傾聽對方的難處與困境，以及共同解決目前的問題。

運作透明化：指的是資訊分享、資源共有兩層面的意涵。資

訊分享的概念是指在操作過程中，需有標準化的操作流程與規則，且某些處理上的相關資訊可與其他單位互通有無；而資源共享，指的是一些資源，諸如設備、人才、經費等，彼此願意共同享有。

需要時間的配合：溝通與協調碰到瓶頸，不見得只是知識、技術與方法等的問題，很可能也需要時間的等待，才能找到答案。

以個案中心的監督機制

由於家庭暴力事件處理的單位十分龐雜，因此當被害人鼓起勇氣出面求助時，她所面臨的狀況，常是多元分割且不連貫的系統。此系統中的各單位，只負責處理本單位職責，至於其他單位是如何處理此同一被害人，則為單位中人無力與無能了解的議題，如此一來，在處理上，就自然會碰到疏漏、重複、無效能、時間拖延等相關的問題，為此，杜魯斯模式，建構了一套以個案為中心的追蹤與監督機制，也就是從被害人打九一一報案系統開始，所有涉及處理的單位，包含九一一勤務中心的人員、緊急庇護中心的人員、法官、檢察官、緩刑監督官、加害人處遇人員、獄卒、警察、社工員等，均需要受到監控，以徹底詳細了解，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以下是此監督機制實施的重要原則：

列下所有處理家暴的相關單位。

確認各單位能分享的重要資訊（內涵），並獲得各單位的共識，且建立標準化的格式。

資訊的登錄必須確實易懂、儲存需安全、保密與即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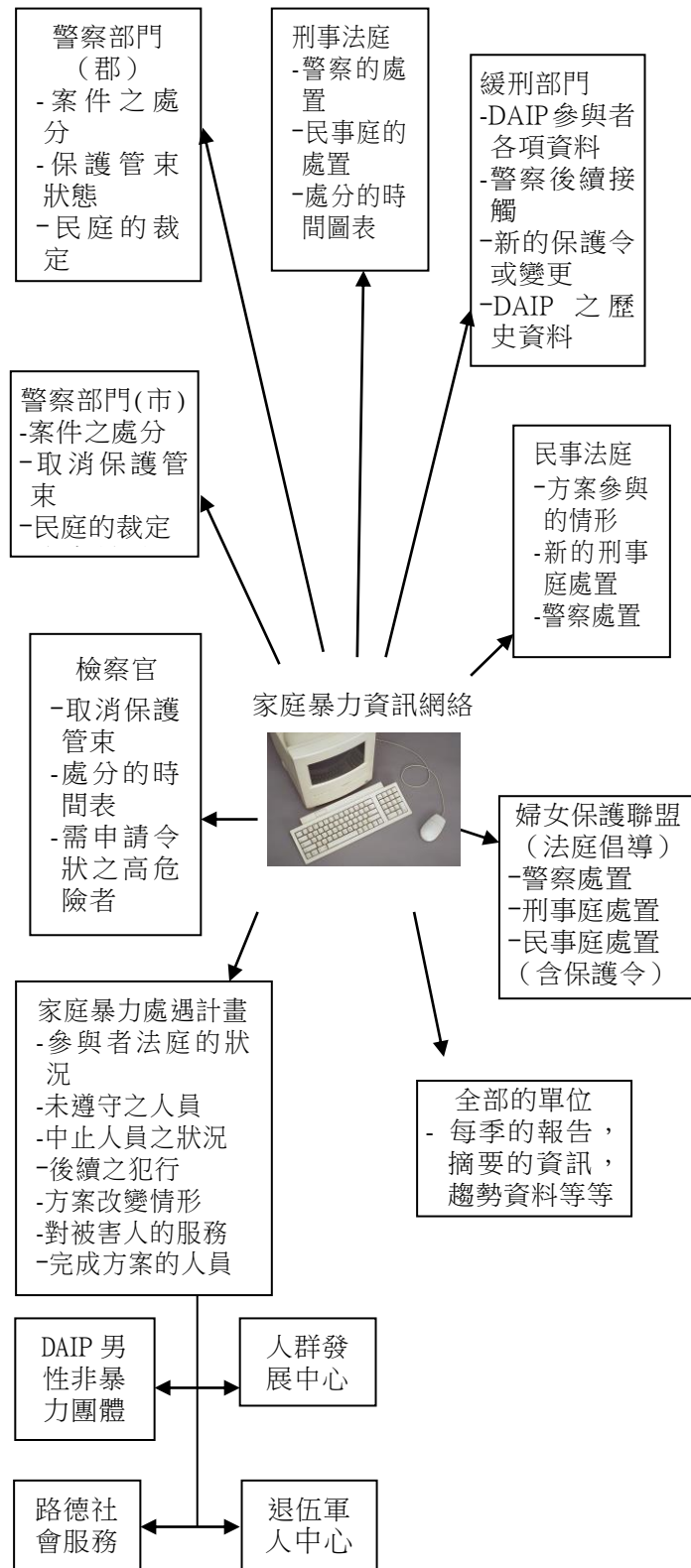
建立登錄與傳送的電腦化處理系統

監督機制所包括的單位與呈現的內涵：

杜魯斯模式為此所建構的系統，名稱定為「家庭暴力資訊網絡」

以確保被害人的安全。

以下是此追蹤系統的優點：



(Domestic Abuse Information Network, DAIN)，以圖表說明：

由此可知，杜魯斯模式是以被害人所需的服務內涵，作為追蹤系統的核心，在追蹤的同時，也與所有相關單位分享重要的資訊，

對被害者的安全更為注意
確保每一個家暴處理者負起責任
促使加害者得到適當的處分

資料譯自：Shepard Melanie F. & Pence Ellen L. (1999)
Coordinating Community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p99

找出疏忽遺漏的案件

找出過程中損及被害者安全的議題

確認規範下可能產生的偏差類型

提供方案評估、訓練與規劃所需的資訊

追蹤系統的問題與障礙

資訊取得困難

實務者無法掌握系統的理念與應用

增加機構人員的工作負荷

電腦與技術上的問題

資訊系統的複雜性

需要多元且專業的人員，負責建檔、維修與管理

克服問題的關鍵

找到有能力掌控全局的關鍵人物

與各組織層級建立持續的關係

聚焦正面的效果與可能的利益

持續溝通共有的目標並強化正面的宣傳

為監督系統挑選一個獨特且便於記憶的名稱 (DAIN)

建立一個具有相關技術與知識的團隊

讓系統簡單化

建構系統成功的操作步驟

處理原則、流程與表單的訂定

每一個單位所負責處理的家暴內涵均有不同，然而卻可能在處理時，因沒有建立標準化的原則、流程與表格，而使處理的程序，

隨著處理者今日的情緒起伏與忙碌與否，而使被害者獲得不一致的待遇，因此，為使被害者的安全不是建立在一時的衝動、短暫的記憶與個人的承諾上，各機關均應建立標準化的處理原則、流程與製作相關的表單。以下首先說明以被害者為中心，所需要的各機關服務內涵，接下來再看各機關所應具備的重要處理程序與表格：

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服務流程與內涵（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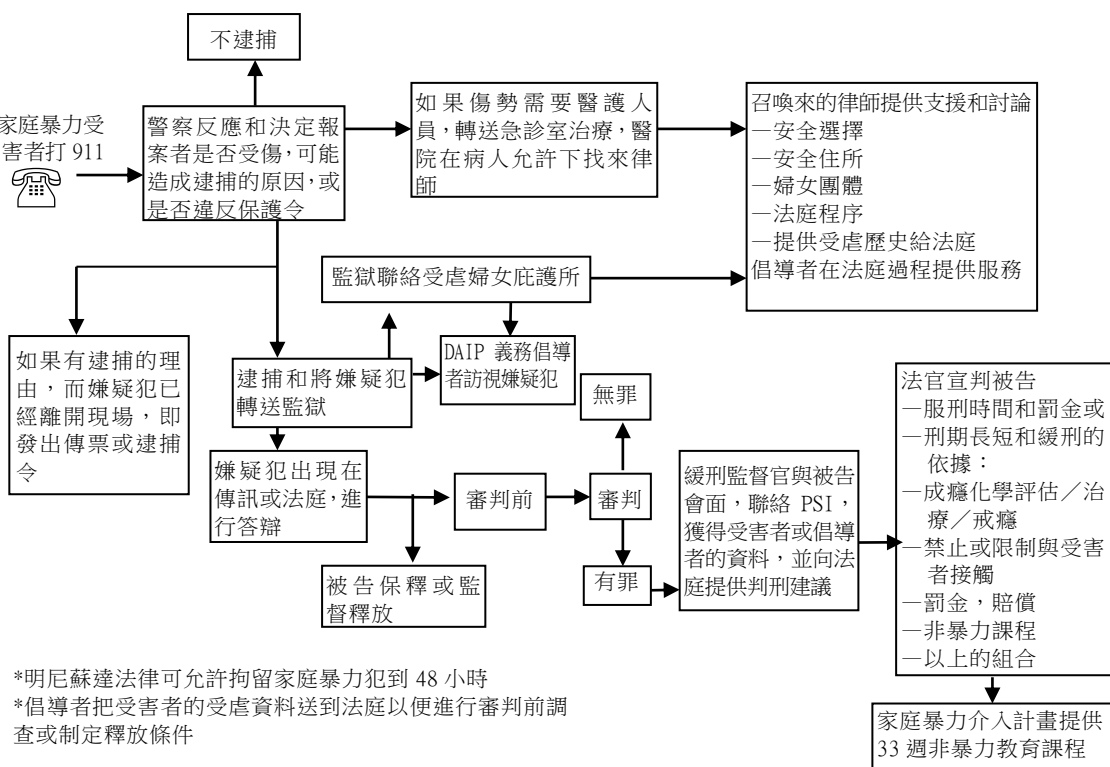
以一樁宣稱有同居人涉及的家庭暴力事件為例。警察根據被害者身上明顯可見的傷痕，認為這位男性確實有攻擊行為，警察逮捕了這位被控的施虐者。在做完了筆錄之後，獄卒通知婦女庇護所，告訴他們逮捕案件、罪名，和受害者的姓名、地址和電話。庇護所接到通報後，則會派出一位義務的倡導者 (volunteer advocate) 到受害者的家裡，解釋法庭程序、告知可利用的庇護所，以及幫助她決定是否要申請保護令，並同時與其討論加害者釋放後的安全計畫。此外倡導者也會與被害者討論有哪些資料可以提供給法庭，以便幫助審判前釋放執行官 (pre-trial release agent)，緩刑監督官 (probation officer)，或法官 (judge) 可以做出適當的決定。倡導者還鼓勵她來參加每週的受虐婦女教育團體。

被控的施虐者會被拘禁至第二天早上等候傳訊，在(他)被釋放前，杜魯斯方案也會派出一位社區的義工，到監獄裡和施暴者商談施暴問題的非暴力課程參與情形。這位社區義工也會記下任何施虐者可能做出的威脅，並告訴庇護所。

被控的施虐者經傳訊，如果宣稱自己無罪，就會舉行一場審前釋放面談，並向法院做出建議。如果他表示有罪，就會開始進行判

決前的調查，而受害者可自行或經由庇護所的倡導者向緩刑監督官表達她的考量。這些受害者的資訊經由值班的倡導者與審前釋放執行官或緩刑監督官，討論進行判決前的調查。審前釋放建議或判決前調查建議，都會在當天送回法庭。

緩刑監督官在判決前調查的第一次辯論中，沒有加重刑期的情



資料整理自：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 (2000) *Coordinated Community*

Response to Domestic Assault Cases: A Guid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月三年二十九國民華中

— 326 —

期一〇一第刊季展發區社

形下，建議三十或六十天的拘役，和參加杜魯斯方案的二十九週教育課程，如果受害者表示遭到虐待與毒品或酒精有關，緩刑的條件通常會包括一項成癮化學評估以及任何建議性的治療。根據受害者的要求，緩刑監督官也許會建議施虐者禁止或有限度接觸受害者的判決。

施虐者在罪刑答辯和判決前調查的同一天被判刑，除非是有可減輕刑期的情形，如虐待兒童的申辯。法官通常會根據緩刑監督官的建議來判刑。緩刑的施虐者必須在判刑後的五天內與 DAIP 約好進行評估。

如果案件在要求保護的情形下送到民事法庭，因保護被害者的考量，法院會下令對受害者進行幾項保護措施。這些保護措施基本上和緩刑的情形類似。通常會有禁制令，禁止施虐者一年內接近受害者的住處，如果受害者有要求的話，也可以延長到施虐者參加輔導或非暴力課程之後。這種命令通常也包括要求與 DAIP 教育課程的合作。這種命令通常禁止施虐者對受害者進行騷擾、威脅或施暴，並時而會給予短期間的監護權及有條件訪視孩子。

被要求參加杜魯斯方案教育課程的人，必須參加由 DAIP 的成員陪同的入門訓練，以便評估和分派至各小組。參與者參加二十八堂教育課程，結訓後，會被邀參加後續的成長團體。

在參加 DAIP 的入門課程之後，後續會有 DAIP 的倡導者與施虐者的配偶聯絡，使她們了解更多的施虐歷史，並邀請她參加 DAIP 受虐婦女的團體課程，並告訴她如果又遭到攻擊的話，該如何因應，並確定她知道如有需要時，庇護所在哪裡。

如果施虐者經常未出席教育課程，或者在緩刑或保護令期間使用暴力，計畫的人員就會要求召開撤銷緩刑的聽證會，或者審查聽證的民事法庭。在緩刑的案件中，法庭也許會判以原有或部分的人獄判決，並再次要求施虐者，在服刑之後，完成所有的教育課程。在一些民事案件裡，施虐者也許會因為藐視法庭而被監禁，並必需選擇被監禁或是完成課程。

由此可知，相關單位在處理時接合的密度，也就是因為家暴處理的司法與社區整合性高，被害人的安全才能較為徹底受到保障。相關單位重要的處理指標與表格

警察單位：逮捕報告、注意事項檢查表、加害人危險評估表等。
社工單位：個案資料表、逮捕後追蹤評估表等。

緩刑系統：審前調查表、審前調查補充表、轉介家庭暴力介入單位表、假釋條件表。

檢察官：偵察案情問話內容注意事項。

法官：量刑參考表（請參考附件）。

所有機關：政策檢核表。

這些表格均反映出各單位在處理時，已建立極細緻的處理程序與注意事項，而非完全以處理者的心證與喜好，處理家暴案件。

發展評估實務的策略與方法

在一九九五年，杜魯斯模式運用加拿大社會學家（Dorothy Smith）的研究方法，發展一套評估實務的新過程，目的是為調查系統中的流程與例行工作，是如何影響機構的目標（安全、責信、改變對暴力容忍的環境）。

Dorothy Smith 的方式，是檢視案件處理的每一個步驟，以發現實務的操作不當，所導致的不良後果，並做出五年改變計畫。此項審核是完全以文件化的手冊方式處理，稱之為家庭暴力的安全與責任審核 (Domestic Violence Safety and Accountability Audit)。

而審核過程的成員，包含跨機構的團隊，共有警察局、緩刑處理單位、檢察官辦公室、法院行政辦公室、以及被害人倡導團體。團隊的成員觀察每一個過程中的細節，以及訪談參與的實務者。這樣的審核提供社區未來規則上改變的藍圖，以及指引實務者如何實踐機構的目標。

解決問題的機制與策略

前述在「溝通」的敘述中，特別說明各單位均需建立不同層級的溝通管道，以方便在發現問題時，不會流於情緒化的指責與抱怨，而能理性的分析問題，並協助相關單位的成員，能發展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因此如何發展問題解決機制與策略，就成為杜魯斯模式中重要的運作內涵。

建立整合型的委員會

委員會的成員，包含了各單位家庭暴力處理的決策級領導人，其目的在於提昇溝通與增進整合的機會，委員會通常會再分成數個小組，以進行不同主題的深度討論，會中強化問題的探討，解決問題的對策，以及再如何形成政策，以引導實務的進展。

建立溝通的非正式管道——午餐的約會 (brown bag lunch)

參與午餐約會的成員包括假釋官、倡導者 (庇護所)、加害人教育團體、DAIP 的實務工作者 (非決策者) 等，藉著非正式的溝通，與沒

附件 家暴犯罪判刑建議矩陣圖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類型四
犯行	加害人承認對受害者的犯行，卻沒有毆打的證據。加害者也沒有暴力史。	加害者毆打被害人，但卻沒有經常性與嚴重的暴力行為或是加害者也沒有曾經毆打其他的人。	加害者曾建立毆打現在或過去被害人的模式，審判前的調查顯示毆打很可能會繼續，而且會更嚴重與頻繁。	加害者審判前的調查證明迷亂的、嚴峻的毆打本質將對此被害者或是其它的被害人有高度的危險。
暴力史	加害者承認一個無法類型化的暴力行為，也包含被害者使用不合法的暴力與活動控制或企圖停止加害者對她們的暴力行為。	使用較輕微的暴力行為以及威脅恐嚇被害人。	加害者有多項的暴力，使得警方必須與他接觸，諸如對被害者騷擾、違反保護令以及重複威脅與攻擊被害人。被害者非常害怕其對身體上的傷害。	除了類似類型三的暴力史外，也包含跟蹤、威脅要導致嚴重的傷害與死亡、運用武器或是威脅要用武器以及已經造成需要醫療照顧的傷害。
考慮方向	在此案例中的加害者，若繼續被她攻擊的人毆打，緩刑官會考慮雙方面的安全，特殊的方案會被推薦，以及緩刑官不會考慮入監，除非攻擊是非常嚴重的。	建議聚焦在被害者的安全以及復健的方案而非處罰。	被害者安全的建議是與以處罰為導向的判刑為主，諸如延長緩刑與執行入監的時間與復健的方案。	要以被害者安全為最重要的考慮，包含保護孩子們的安全、一個實質的服刑期以及長期的緩刑、若加害者還能修正，也應考慮結合一些其它矯治的方案。
拘留或其他的矯治方案	30 天的暫緩監禁（30days stayed jail）	60 天的暫緩監禁（60days stayed jail）	60 天的暫緩監禁、10 到 30 天的執行監禁/60 到 90 天的暫緩監禁，20 至 30 天的執行監禁	60 至 90 天的暫緩監禁、20 至 30 天的執行監禁/60 到 90 天的暫緩監禁/30 天的暫緩監禁，60 天的執行監禁，或 90 天的 straight time
重大的犯罪拘留、或是其他的矯治方案		91 到 120days 的暫緩監禁，0 至 45 天的執行監禁（executed jail）	91 到 120 天的暫緩監禁，45 至 120 天的執行監禁/120 至 180 天的暫緩監禁，120 至 180 天的執行監禁	120 至 180 天暫緩監禁，120 至 180 天的執行監禁/180 至 365 天的暫緩監禁，180 至 365 天的執行監禁。
緩刑期間	一年	一年	二年	二年

資料整理自：Shepard Melanie F. & Pence Ellen L. (1999) Coordinating Community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p57-58.

有防衛的心態下，交換家暴處理上的理念、困惑與疑慮、對其他單位的建議等，以強化共識、增進信任，並提昇解決問題的資源與能力。

建立溝通的正式管道——聯繫會報

相對前述的午餐會報，聯繫會報的主要功能，在於解決政策方面的議題，換句話說，相關的細節，均已溝通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決策者拍版定讞，因此參與聯繫會報的成員，包括相關單位的決策者，諸如檢察官、假釋官、法官、心理衛生中心與庇護所等機構的領導人。除了有決策方面的功能外，聯繫會報也扮演分享方案內容與活動成效的功能。

建立跨單位問題解決的各層級對口人員與表格

在案件處理的過程中，隨時有可能發現各單位處理上的問題，有時是屬於個人的問題，也有時可能是屬於機構處理的理念與程序面的問題，若等到下次的會議，有可能會延誤處理的時效，此時就需要立即進行協商，而協商的人員，需要各層級有固定的人員，以進行對話，諸如局長對局長、督導對督導，協商的人員可視問題的大小，將所面臨的問題，寫在相關的表格上，或透過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的處理方式，告知對方，若問題有具體的協議，也須經過書面的方式，共同約定今後處理的方式，以確保不再犯第二次錯誤。

持續與強化案例研討的訓練

當發展處理案件的過程時，我們瞭解大多數的實務者均是一般的人，因此原則、流程、相關的表格，均需很容易使用，且須藉著不斷的訓練以確保實務工作者，懂得如何操作，否則使用者將會重回較簡易的方法，或原來的習慣來操作實務。

至於訓練的方法與內容應聚焦於案例的說明，以便使實務者可應用這些指導性原則與規範。目前杜魯斯模式已發展出這樣的訓練內涵，所有的課程均運用實例來說說政策與流程，例如在警察方面的訓練，就有一系列的錄影帶，來說明不同案件的處理，而且每一個錄影帶均引導出一個特殊的調查面向，諸如指出主要的攻擊者、決定可能的原因、區辨出真正的防衛性攻擊、記錄暴力的歷史等等。每一項訓練的重點均聚焦於案例的研討。

同樣的，對緩刑監督官而言，也替他們準備了十個案例，然後要求他們把加害者放入恰當的量刑參考表中（請參考附件）。緩刑監督官接下來要討論，為何他們把某一個加害者放入第一、二、三、四類的矩陣中。在執行這樣的訓練中，同時也可考驗規範的應用與適切性。此種訓練的效果，是在於讓實務者瞭解隱藏在每一個規則、政策與必備條件下的意圖。這同時也引發系統中，如何與其他單位連結上的討論。這將協助實務者指出處理上的許多難題，並獲得解決的討論與資源。

人員的安排與經費的取得

杜魯斯方案的執行成員並不多，其中包含一個從庇護中心轉任過來的法律倡導者、一個曾在庇護所擔任志工的秘書、一個行動者，由於杜魯斯方案所建構的是一整合型的社區模式，方案的成員必須與不同的系統人員進行協調，因此其運作的目標，並非屬於個別案件的倡導，而是扮演監督、協調各單位的角色。

協調的相關單位包括執法單位，諸如監獄、檢察單位、刑事和民事法庭、緩刑單位、加害人輔導計畫、庇護所或受害者保護計畫

等的人員。每個單位都有其特殊地位與角色扮演，在協商的過程中，也難免會有衝突，若此方案的經費是來自於某政府單位，就難免產生協商時的限制，因此，杜魯斯方案僅從地方政府獲得很少的經費，大部分的經費，來自私人的募款與中央的經費，以確保協商時，角色的公平與客觀性。此外，杜魯斯方案也特別注意不去排擠庇護所的經費，以確保為受虐婦女優先提供安全住所，和法律服務的保護經費。

四、結論

綜而言之，杜魯斯方案是以社區與司法為主的整合性方案，期望在以被害者安全為主要的考量下，進行社區內各單位內與單位間整合上的改革，其中最難能可貴的是，杜魯斯方案也將司法單位納入整體的網絡與改革中，並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要求司法系統與相關單位，作出具體的回應，這些均是臺灣目前力有未逮之處。

在邁向整合的過程中，杜魯斯方案所運用的理念與方法，不是批判與指責，而是了解與集思廣益後的面對問題，期間塑造了理性面對問題的信任與安全環境，並期望在這樣的共識與氣氛下，繼續探索與反省尚未完成的被害者安全保護工作。

杜魯斯方案的理念與操作實務面，均有值得臺灣借鏡效法之處，尤其目前臺灣的司法系統，並未敏感到，當一個被害婦女到法院尋求協助時，夫妻間所存在的不平等關係、暴力的歷史，以及個

別婦女因其種族、性特徵、社會階層等帶來的複雜經驗，所產生的不同問題，此外，現存的刑事司法系統，往往使家暴事件的處理變不同問題，此外，現存的刑事司法系統，往往使家暴事件的處理變的更為困難。而這些問題包括，片段而非整合的爭議、緩慢的事件處理過程、使被害者處於與加害者敵對的立場，以及相關的脈絡（諸如規則、形式、流程與報告）都不是設計去引導實務者重視被害者的安全以及控制加害者，也因為如此，杜魯斯方案的種種作為，更加吸引關注臺灣家庭暴力處理者的注意，希望此方案的介紹與引進，能帶動各單位與司法系統更多實務面與整合性的改革。

（本文作者：張錦麗現任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法務部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內政部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王珮玲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婦幼安全組組長、中央警察大學兼任教官、美國羅格斯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博士候選人，柯麗評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學生）

◎ 參考文獻：

- 詹火生（二〇〇〇）。政策分析，社會工作辭典第四版，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頁三八六。
- Shepard Melanie F.& Pence Ellen L. (1999) Coordinating Community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 (2000) Coordinated
Community Response to Domestic Assault Cases: A Guide for
Policy Development.